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九)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作者：赖荣源

确证当地血吸虫病的严重问题后，又亲自下令安排北大在江西的农场撤回北京。源于工作规划的重大疏漏导致北大江西农场撤销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过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回北京以后我分别参加了1973年度和1974年度北大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工作。1973年具体负责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三江平原等地的招生工作。在工作过程中，遇到几件事情需要我慎重处理。

第一件是关于一位女知青报考北大的问题。我们北京高校联合招生小组有一位代表某一重点学校的军人招生工作人员向我推荐一位报考北大中文系的女知青。不过经我多方调查，了解到下面有许多群众反映她与部队领导有暧昧男女关系，反对意见很大。而这又发生在严打兵团个别领导性侵犯迫害女知青事件之后的敏感时期，需慎重处之。我如实地向北大驻哈尔滨招生办的领导汇报相关情况，经商议决定，北大不能录取该生，后来据悉该生是由上述高校录取的。

第二件发生在伊春地区，我弟弟当时在该地工作，他告诉我，当地群众中早已盛传地区第一把手的女儿被推荐考北大，北大在该地区唯一的招生名额中文系汉语专业是非她莫属，而且她在北大某系有个亲戚，北大录取该生后可以帮助转至该系。就此传言我下去作调研，确认反映的情况属实。我也跟该生进行面谈，借此了解到她的文化程

度属初中生水平而汉语专业对考生文化程度的特殊要求却是必须具备高中文化水平。同时我从推荐考北大的招生名单中发现有一女考生具备高中的文化程度，且该女考生是工人家庭出身，政治上没有任何问题。根据上述情况我初步决定录取该女考生。不过来自省会的一位高校的招生小组领导劝我可考虑以变通方式录取首长女儿，以免“节外生枝”。他们提出上述意见并不奇怪，与我们来自京城的外来招生人员不同，他们地方招生人员可能有其自身处境的考虑，而我们则可以完全按原则办事。于是我通过一位客家老乡掌管的有关机构的直通专线电话直接跟北大驻哈招生办领导通话，他同意我提出的招生方案，录取那一位女高中生。幸好这件事发生在轰动一时的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发生之前，我们得以免受那场鼓吹政治挂帅，大批“考分挂帅”的高考政治风波的冲击，回想起来有一点“后怕”。

我参加的1974年度高校招生工作，地点是在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招生办公室。该室由该委的相关人员和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三家各派一人组成，我便是北大的代表。在此长达近半年的时间，我有机会亲身见证和体验机关工作方式、运转机制、人际关系和工作氛围诸方面同高等学校均有相当大的差别。我感觉自己可能较适合于从事教师工



印尼巴中初中毕业证书

作。

上世纪70年代我随学校迁回北京以后，耳闻目睹我的很多亲戚朋友纷纷移居境外或正在办理相关出境手续。面对这场出境潮，刚从远离京城的五七干校回迁的我显得“孤陋寡闻”，感到迷惑不解。

后来一位从外地来京办出境手续的堂弟告知我当前有关归侨来去自由的政策，同时他同我在东北林区工作的大弟弟联系，问他是否愿意跟他同行。不过堂弟似乎没有收到我大弟弟的回音而自己自行出境。

当时我了解到我们分散于全国南北方的七个兄弟姐妹均尚无出境意愿，工作生活诸方面虽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基本是有保证的，且我跟父亲提过，他只需全力照顾好国外家里留下的四个小弟弟妹妹即可，无需再多费心于国内的子女。实际上，父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坚持给我们以一定的经济资助，可能意在让我们安心留在国内。据悉父亲还跟我妹妹提过香港

并非一个好去处。后来我的一位妹妹随丈夫移居香港，不过行前我妹妹的舅舅曾当面对我说过，他将安排外甥到自己公司工作，使他们的家庭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然而，对我而言，是否出境，涉及的并非纯粹生活出路问题，而是涉及我的信仰，对祖国发展前途的信心，是否坚持当年自己回国的初衷（初心）和牢记自己的理想（使命）等重大问题。回顾这一段经历，我想自己对上述人生道路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明智抉择，成就了自己的无怨无悔的人生。

回望十年动乱，政治运动中几经反复折腾，我深切痛感所谓文化大革命浪费了我们的青春年华，使我们失去了成才立业的美好机会。岁月不居，那时我在北大经济系先后已度过十年寒窗和十年动乱的漫长岁月，不知不觉已步入不惑之年，而事业上却还处于“壮志未酬”的窘况，不免令人感受到青春年华几近虚度的悲情。

教书匠心

1976年打倒“四人帮”以后，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北大燕园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当时“百废待兴”，世界经济专业为适应新的形势，重整旗鼓对教学计划和课程作了重大调整和改革，打破了偏重于国别经济课程的局限，设置和充实新的专业课程。

根据分工，我准备承担“资本主义货币与银行”课程的教学任务，为此，我按时到具有教授部门经济课程优势的中国人民大学听课进修，多方收集和钻研相关书籍与资料，下功夫积极备课。与此同时，我也开始考虑强化英语学习。我上大学本科时，俄语是外语课的唯一选择，且仅限两年的俄语基础课，欠缺实际应用的机会和能力；研究生学习阶段，根据专业需要，自己花了不少时间与精力努力自学英语，刚打下一些基础，却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半途而废。我痛感英语水平低是我们从事涉外专业工作者的“软肋”，是熟练掌握一手资料的“拦路虎”。

回想我自己的一段经历，感触颇深。改革开放初期，我的专业学业已荒废多年，1979年我上第一堂美国经济课，题目引人注目，引来了众多旁听者，其中还有一些外系的青年教师，但是第一节课讲完了后，听课者一下走了一半，给下马威，弄得我在第二节课深感失落，这堂课算是搞砸了。

痛定思痛。究其原